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子題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

ON ISSUES AROUND ONE CHILD POLICY IN CHINA

风笑天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
一
題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

ON ISSUES AROUND ONE CHILD POLICY IN CHINA

风笑天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风笑天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1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ISBN 978 - 7 - 5141 - 2528 - 3

I. ①中… II. ①风… III. ①独生子女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6363 号

责任编辑：张庆杰 程振峰

责任校对：刘欣欣 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责任印制：邱 天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

风笑天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33 印张 620000 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2528 - 3 定价：8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經以何士

過往而來

賀教務部

毛澤東同志

A·毛澤東

毛澤東
毛澤東



课题组主要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乐 章

张艳霞

关 颖

郝玉章

陈友华

唐利平

肖富群

穆光宗

编审委员会成员

主任	孔和平	罗志荣		
委员	郭兆旭	吕萍	唐俊南	安远
	文远怀	张虹	谢锐	解丹
	刘茜			



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强大动力。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理论创新为主导，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立足创新、提高质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发展局面。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理论创新，服务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自 2003 年始，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计划。这是教育部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招投标的组织方式，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立项，严格管理，铸造精品”的要求进行，每年评审立项约 40 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 30 万～80 万元。项目研究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鼓励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联合研究，鼓励吸收国内外专家共同参加课题组研究工作。几年来，重大攻关项目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提升为党和政府咨询决策服务能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战略目标，集合高校优秀研究团队和顶尖人才，团结协作，联合攻关，产出了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壮大了科研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实力。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为此做出重要批示，指出重大攻关项目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影响广泛，成效显著；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紧密服务国家需求，更好地优化资源，突出重点，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个重要批示，既充分肯定了重大攻关项目取得的优异成绩，又对重大攻关项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殷切希望。

作为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秉持以管理创新

服务学术创新的理念，坚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对重大攻关项目从选题遴选、评审立项、组织开题、中期检查到最终成果鉴定的全过程管理，逐渐探索并形成一套成熟的、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管理办法，努力将重大攻关项目打造成学术精品工程。我们将项目最终成果汇编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文库”统一组织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倾全社之力，精心组织编辑力量，努力铸造出版精品。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欣然题词：“经时济世 继往开来——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成果出版”；欧阳中石先生题写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书名，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强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要求。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新实践，适应新要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精神，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前 言

20世纪最后20多年，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它不仅造就了规模多达1.5亿人左右的整整一代独生子女，同时还给今天和明天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30多年过去了，在国家和各级政府计划生育部门的积极努力下、特别是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政策实施之初所提出的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目标已顺利实现。但政策带来的客观人口现象以及由这种人口现象所引发、所导致、所影响的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与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保障，以及社会风险密切相关的一些现象与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这些问题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我们进行探讨、解释和提出应对方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部在2006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指南中专门列出了“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27）的课题，向学术界提出了探索这一重要社会现实问题的目标。由风笑天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成功申请到这一课题，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著作就是该研究团队经过四年时间努力探索所取得的最终成果。

这一研究成果由导论和四篇构成，总共十五章。

第一章导论在系统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课题所依

据的总的框架，即从多学科视角来研究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新框架。这一章也成为整个研究的基础和指南。

第一篇“教育、社会化与性别平等”，共包括四章。分别探讨了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独生子女青少年的性别角色社会化，以及农村独生子女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研究者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主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得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研究结论。

第二篇“婚姻、生育与家庭关系”，共包括三章。分别探讨了青年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角色、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青年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以及独生子女婚姻的稳定性等问题。研究结果向人们展示了这一领域中一些新的发现。

第三篇“居住方式与养老保障”，共包括四章。分别探讨了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方式与家庭结构、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城乡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与社会保障等问题。研究结果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

第四篇“独生子女风险与生育政策调整”，共包括三章。分别探讨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风险、独生子女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关系等问题。这一篇是同国家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制定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研究结果也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参考。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其前沿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成年独生子女及其相关现象上，比如第一批独生子女的婚姻角色、亲子关系、夫妻权利等等。尽管目前进入婚姻的仅仅是第一批独生子女，其比重在全部独生子女中只是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但研究者意识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在大量更年轻的独生子女身上。因此，这种提前研究可以较好地指导社会提高认识，未雨绸缪，做好相应的准备。其次是将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放到研究的议事日程中。虽然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基本上还都没有进入老年，但他们的养老问题却从30年前独生子女刚刚产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存在

和决定了。对于有着深厚家庭养老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问题无法回避。本研究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探讨这一前沿性问题。第三是突出地探讨了与独生子女现象密切相关的生育政策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了30余年，国家提出这一政策时的“一代人”方案，目前在时间上已经到期。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存在哪些风险？我国的生育政策又该如何调整？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无疑具有很好的前瞻性。

本研究的创新性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系统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多学科视角研究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新的框架，这一新的框架很好地促进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二是在研究对象上涵盖了从中学生到大学生、从在职青年到已婚青年的各个阶段的独生子女，同时，既涉及独生子女人口主体所在的城市家庭，也涉及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通过对多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研究对象开展调查，课题组收集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定量数据；这种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数据资料的综合性是以往的研究所不具备的。三是第一次对农村独生子女开展大规模调查，并系统探讨了受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农村地区由于独生子女的出现对性别平等的积极影响。四是对于青年独生子女婚姻关系和婚姻稳定性进行了专门研究，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结论。

中国社会在发展，独生子女人口在增长，独生子女家庭在增加，独生子女现象和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我们目前的研究只是不断探索和回答有关中国独生子女问题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在新的现实和问题面前，我们仍会继续努力，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更准确地认识独生子女问题的内涵和规律，为社会持续提供关于这一特定人口、特定家庭以及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更为丰富和有价值的知识。



摘要

在系统回顾和评论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研究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多学科框架。以这一新框架作为指导，研究者利用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分别从独生子女的教育、社会化、性别平等、婚姻、生育、家庭关系、居住方式、养老保障、家庭风险以及生育政策调整等众多不同的维度，多方位、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与第一代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家庭相关、同时也与整个中国社会相关的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具有一些不同于普通多子女家庭教育的新特征，家长的素质与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质量密切相关；在性别角色社会化方面，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这两个不同群体存在一定的差异，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少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同时，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大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受同辈群体的影响更大；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中生育独生子女能明显地促进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平等。女儿的地位在独生子女家庭获得了实质性提高，一些过去不容置疑地属于儿子的家庭价值，比如家产继承、家庭养老等，现在在女儿身上获得了认可，并且独生子和独生女在教育获得、职业发展方面也实现了平等；这一结果无论是对于农村背景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性别平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结果还表明，青年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在“夫妻角色”和“父母角色”的认知与行为方面，具有一致性和趋同性；在亲子关系方面，两类青年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别，有无兄弟姐妹对他们

在青年时期的亲子关系并未形成明显的影响；已婚青年的夫妻权力与青年的独生子女身份也无关系，因此，涉及已婚青年在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与冲突现象及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到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的身上。研究结果还揭示出，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的负面宣传、将他们描绘成婚姻不稳定的负面形象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此外，研究所得出的“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大约只在 30% ~ 40% 的结论，为未来进行生育率变动状况的计算和变动结果的预测，无疑提供了新的、同时也可能是更为符合客观现实情况的参考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在居住方式方面，小家单独居住目前还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这也是他们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相同的地方。但是，目前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在居住方式的总体分布上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明显不同。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单独居住的比例大约在 60% 以上，高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单独居住比例的 25%；目前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空巢期的比例大约在 35% ~ 40%，相比较而言，独生子女上大学是造成父母进入空巢期的最重要因素。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空巢期时的平均年龄在 48 岁左右，而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则平均在 51 岁左右开始；从总体上看，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所具有的养老心态和养老认识是积极的，令人乐观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面临养老，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们已经开始了养老观念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的结果无疑会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生活预期、特别是他们对老年生活质量的评价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书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未来的中国城市社会中，当家庭养老以及社区养老的方式不能完全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不能满足特定老年人群体养老需求的情况下，机构养老或许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果社会中的老年人普遍做好了到机构养老的心理准备，再加上养老机构在基础条件、服务规范和工作实效方面逐步完善并逐步走上正轨，那么，机构养老或许会成为与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同样重要的一种养老方式，养老机构也会在解决我国社会的养老问题中发挥同样重要的

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本研究结果中对政策制定来说最有意义的。此外，本研究结果同时也指出了目前的独生子女政策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从政策制定的层面提出了应对这种风险的思路以及调整政策的途径和方法。

Abstract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only child in China multi-dimensionally with several nation-wide survey data. Education, socialization, gender equality, marriage, fertility, intra-family relationship, mode of residing, “empty nest”, aging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risk and adjustment of one-child policy are examined empirically in the present study and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only child in China, it is shown that the study of the only child in China should not be only associated with parents and families of one child, but also be embedded in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home education of the one-child families has some different feature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hildren with siblings, and the quality of parent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outcome of one-child families education;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male preference are weaker for only children than children with siblings, which, in consequence, makes the two groups some differences in socialization of gender; concentrating in the families of orientation,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can affect their children more than those of children with siblings; howeve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or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only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siblings; it is shown, focusing on the families of procreation, that adult only children have no difference with children with siblings on identity and behavior of “couple” and “parents”, and the marital power of married young people als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nly children or no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t is not wise to attribute the conflict of marriage to only children arbitrarily.

The present study also find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marriage of only children is much more stable than the mass media has reported; for the married only children, most of them, just as children with siblings in the same birth cohort, prefer not to co-

reside with their parents;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co-residing with parents between married only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siblings, more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live alone (more than 60% versus about 25%); it is identified in urban China that about 35% – 40%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of first generation has entered into “empty nest”, which may mainly due to the entrance of college of only children of first generation; generally, the average age experiencing empty nest is about 48 for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but almost 51 for those of children with siblings.

Positive aging attitude is found among the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of first gener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have good preparation and expectation toward elderly lives and facilitates their transitions to old. It is also positive that only children in the countryside have more gender equality than children with siblings, there is a process of empowerment for rural only daughters; they tend to have equ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equal career, and more impartment, they are expected to succeed the families, which is exclusive for male in traditional families.

Some of the findings in present study do a lot to the social policy. The results that about 30% – 40% “dual only children couples” are willing t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provide information of fertility changing, which could b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rojections. Positive aging attitude and the changing from “dependent” to “independent” old care implies that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or community-based old care may not be so sufficient that elder care facilities should become part of the solutions in the overall elder care system. Of course, the only children themselves are consequence of one-child policy,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about the risk of this 30 – year old social policy and, as a result, the framework and detailed methods for policy adjustment.